

「知聖」與「素王」

劉小楓

1888年，廖平作《知聖篇》，時年36歲。

今本《知聖篇》不是1888年的原本，而是1901年刊印的本子。其時，廖平又作《知聖續篇》。從1888年初本到1901年的定本，《知聖篇》經過了十餘年修改。一部作品從三十多歲一直想到快五十歲，中西哲學史上都不多見，難道不值得認真看待？

1888年，廖平作《知聖篇》，時年36歲。今本《知聖篇》不是1888年的原本，而是1901年刊印的本子。從1888年初本到1901年的定本，《知聖篇》經過了十餘年修改。一部作品從三十多歲一直想到快五十歲，中西哲學史上都不多見，難道不值得認真看待？

歷代儒生都以知聖為要務，「知聖」又有甚麼好說的？再說，不是好些人都以為廖平思想「稀奇古怪」嗎？章太炎在廖平墓誌銘中讚其「於古、近經說無不窺」、「學有根柢」，又責其說中有「絕恢怪者」。自此以後，業界在評說廖平時，無不沿習太炎腔調，依古文家「家法」，訓詁、明物考辨到家，就是絕活，否則就是「恢怪」之論。到國朝學界，這「家法」大為擴充：甚麼「科學性」、「歷史潮流」、「合符理性」。幸好廖子精通乾嘉功夫，不然考據家必譏其不通絕活還自標高超。廖子了不起，他用乾嘉功夫做出絕活（《今古學考》、《古學考》、《穀梁古義疏》）後，馬上將這絕活判為有眼無珠：「國朝經學，喜言聲音訓詁，增華踵事，門戶一新，固非宋明所及。然微言大義，猶嘗未聞，嘉道諸君，雖云通博，觀其共撰述，多近骨董，喜新好僻，凌割《六經》，寸度銖量，自



矜淵博，其實門內之觀，固猶未啟也」（《經話》甲編卷一4）。「知聖」才是搞通六經的真正起點。

為甚麼事經學要「知聖」？哲學是聖人之事，經學乃哲學，因此要「知聖」。

經學明明是史學，「六經皆史」乃先儒不移之論，何以說經學是哲學？將經學還原成史學，早成中國學術主流，如今，經學只能是經學史，否則必被視為「恢怪」。隨着當今泰西人類學、社會學日新月異，經學史不僅成了社會文化史一種，還經為史也成了「思想進步」。

廖子了不起，他敢踏謔（我川人方言）以史學取代或冒充哲學：以經為史者「以蛙見說孔聖，猶戴天不知天之高，履地不知地之厚」。自近代科學興盛以來，歷史科學和歷史意識「還經為史」在西方同樣氣勢洶湧，有西式乾嘉功夫（古典語文學）的尼采（Friedrich

Nietzsche) 敢於詆毀歷史科學，捍衛哲學，廖子說「六經皆史」之說是「市虎杯蛇，群入迷霧」，為甚麼就不可以？廖子堅定地要經史分家，實為拯救中國哲學智慧之壯舉。

未免誇張罷？宋儒離傳解經，別立四書為經，直奔性理形而上學，不是光大了中國哲學智慧？二十世紀的新儒家大師誰不是接着宋儒往下說，而且聲稱把康德 (Immanuel Kant)、海德格爾 (Martin Heidegger) 哲學也收拾了？

幸好廖子讀宋五子書長大，不然新儒家必譏其不諳性理之道竟自標孔孟傳人。廖子「蚤年研求宋學，漸而開悟，有如伯玉知非，深識知行顛倒」(《四變記》)。這「知行顛倒」四字非同小可，宋儒不曉得孔子哲學是分段數的，對不同的人要講不同的學。「天學」是孔子最隱微的微言，古文家判為「怪異之論」，就是不懂孔子還有「六合之外」的微言。然而：「宋人鑿聞佛說，遂以天學移於修身之前，說玄說妙，談性談心，皆屬顛倒。使孔學至治平而止，則有人無天，囿於六合以內。聖量不全，固已不可；以堯、舜病諸之境量，責之童蒙，眾生顛倒」(《孔經哲學發微：貴本觀》)。漢學還僅是使孔子微言蔽而不明；宋儒把微言當大義，搞出人人可以成聖人的教義，禍國殃民，罪過大得多。

六經是孔子的作品，他受命而寫作，是「素王」，因而「知聖」與「素王」相關(《知聖篇》1)。素王就是孔子，先儒不知道？廖平說，西漢前知道，東漢以來就失傳了，這等於說，已經被遺忘快兩千年了。說這類口氣大的話，要麼是沒有根基的張狂之士，要麼是蓋世大哲。尼采說，西方思想從蘇格拉底一路錯下來；海德格爾說，西方哲人遺忘了對存在的理解已經兩千多年。他們是蓋世大哲，廖平呢？

太炎責廖平學說中有「絕恢怪者」，指的就是「六經為孔子所作」之論。太炎不明廖子所謂「作」根本不是史家意義上的，而是哲學意義上的：「作」乃是素王之舉。何謂「素王」？「素王」即蘇格拉底—柏拉圖的哲人——關切何為應該的生活和公義的秩序的人，他為天下立法，應該是現世的王。但哲人無法實際上真的為王，只能制訂天下法，以俟懂理的君王。哲人一王的連結，用中國話說就是素王。哲人本質上是die Tyrannei der Werte (價值的僭主)，如果souveraineté du peuple (主權在民)，而非souveraineté de l'intelligence (主權在智)，生活中還有高貴的道德這回事嗎？孔子「作」《春秋》是孟子所說的「天子」行為，所謂「天子」行為，就是在homo hominis lupus, 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 (「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」——霍布士[Thomas Hobbes]；「仁義充塞，則率獸食人，人將相食」——孟子)的自然狀態中為人世立法。

孔子不是自己說「述而不作」嗎？孔子的話還不可信？這是史家自以為最有力的反駁。然而，「可與言，而不與之言，失人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，失言。知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」(《論語·衛靈公》)。夫子並非甚麼話都對弟子直說，而是看人說話，甚至隱瞞自己的所為。「『天生』之語，既不可以告塗人，故須託於先王，以取徵信」(《知聖篇》4)。

孔子所謂「不作」，是對不適於聽的人說的，因此廖子說「不作」是顯義，其隱義是「作」。尼采說，「從前，在印度人、希臘人、波斯人、穆斯林人那裏，總之，在所有相信等級制而非平等和平權的地方，都將哲人分為顯白的(das Exoterische)和隱微的(das Esoterische)。顯白哲人從下往上看，

二十世紀的新儒家大師誰不是接着宋儒往下說，而且聲稱把康德、海德格爾哲學也收拾了？幸好廖子讀宋五子書長大，不然新儒家必譏其不諳性理之道竟自標孔孟傳人。

廖子說「孔子編定六經」，而自比其經學為繙譯，當然就是效法素王。王國維被形而上學可信與可愛的矛盾搞得頭痛，乾脆扔掉哲學成考據家；廖子因嘉道之學未聞「素王」，離棄考據學成哲人。王國維被尊為士林聖人，廖平要未被忘掉，要末遭詆毀，中國哲學智慧日益晦暗，有甚麼好奇怪？

隱微哲人從上往下看！從靈魂的頂峰望下來，悲劇不再是悲愴的了……」（《善惡的彼岸》，30）尼采在這裏忘記提到（而非不知），夫子的話也有顯隱兩義。為甚麼孔子要隱瞞自己作六經？「春秋所貶損大人，皆當世君臣有權威勢力，其事實皆形於傳，是以隱其書而不宣，所以免時難也」（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）。見之行事，而又褒諱貶損，將招致政治迫害。孔子是哲人，哲人非烈士，「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」。因此，「孔子為素王，知命製作，編定六經，皆微言也」（《知聖篇》22）。

廖子立「素王說」以後，又發現孔子不僅隱瞞行天子之事，也隱瞞性與天道的教誨。為甚麼呢？人民需要的僅是知禮，而非知天。對人民來說，知生的意義重於知死的意義。人人知天——人人成哲人（聖人），不僅不可能，也十分危險。宋明儒自標高超，想搞出滿街聖人（哲人）的理想國：「俗儒每以自了為聖賢，須知戶戶道學，家家禪寂，天下正自彌亂耳……沙門無人敢學佛，秀才皆自命為真孔。蓋由直以村學究為孔。……似此恆河沙數之孔子，所以釀滅國滅種之劫運也」（《孔經哲學發微》凡例9-10）。的確，康子說孔子「託堯舜以行民主之太平」，廖子說孔子改制則不言人民有自立自主之權，廖子思想不進步、很封建。然而，哲學本質上就是封建的，民主是哲學的天敵。人民公意來臨之時，就是哲學死亡之時（羅蒂[Richard Rorty]說得客氣：「民主先於哲學」）。當今大儒少有不願擁抱民主制度的——包括傳公羊學的「聖人」，殊不知恰恰根本背離孔子智慧。

列文森（Joseph R. Levenson）譏廖平徒事「空言」，殊不知這不僅是孔子、也是蘇格拉底—柏拉圖等聖人的智慧傳統。廖子「明兩千年不傳之學，義據通深，度越一世，香象渡河，眾

流截斷」（蒙文通），更在於保守這「空言」之學，豈僅在以禮制「判析今古門戶」。「哲學按其本質，只能、且必須是從思的角度來敞開確立尺度和品位的知的渠道和視野，一個民族就是在這種知中體會出自己在歷史的精神世界中的此在」（海德格爾：《形而上學導論》）。經史家譏廖子之學「越變越謬」，證明了經學的終結，簡直無稽之談！廖子經學分明重新確立了經學尺度和品位——孔子不過是其象徵。糾纏於其尊孔論的表面含義，追究其孔子形象究竟是否歷史上的真孔子，根本搞錯了。廖子的孔子既非歷史的、亦非信仰的孔子，而是哲人（素王）的象徵或者「傀儡」（廖平語）。

「聖人不空生」，經學要務首在「知」聖（哲人）之心，聖人之心在六經之中。廖子自比一生學術為翻譯六經，六譯即比一生六變。翻譯有兩種，橫譯和豎譯（paraphrase）。不同語言之間的翻譯是橫譯：「周秦以上通用翻譯，凡在古語都譯今言，改寫原文，不別記識，意同於箋注，事等之譯通，上而典章，下而醫卜，莫不同然」（《經話》甲編卷一29）。翻譯微言是豎譯，廖子合稱兩種繙譯為春秋義例：「《春秋》有繙譯之例，所以別中外，更所以存王法」（《何氏公羊春秋續十論》繙譯論）。廖子說「孔子編定六經」，而自比其經學為繙譯，當然就是效法素王。王國維被形而上學可信與可愛的矛盾搞得頭痛，乾脆扔掉哲學成考據家；廖子因嘉道之學未聞「素王」，離棄考據學成哲人。王國維及其傳人陳寅恪被尊為士林聖人，廖平要未被忘掉，要末遭詆毀，中國哲學智慧日益晦暗，有甚麼好奇怪？

劉小楓 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
學術總監